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 (1949—1955年)

李晨涌, 宋进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历经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公开,进而发展为常态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诉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在场体现,也深度契合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迫切需求。面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话语、文本和媒介等现实问题,党和政府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以建构话语路径、翻译出版经典著作以建构文本路径、完善本土大众传媒以建构媒介路径等来化解问题,从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组织建设,也推进了本土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提升,更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传播的理论探究提供了现实参考。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新疆;传播;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20)01-0001-07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191231.004

1949—1955年是新疆地区实现解放、恢复建设与开始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再次检验的实践过程。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能否真正与新疆地区的特殊语境相结合?能否化解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话语、文本和媒体等现实问题,以满足新的实际需要?能否经历新疆地区的特殊性社会实践的再次检验?对此,本文拟作一个初步的考察,以期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背景

随着新疆地区的和平解放,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使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成为新中国和新社会的主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正是以这些现实因素为考量,而这些因素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背景。

(一)理论地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诉求

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发展并进一步完善。构成中国社会的语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变化的。1949—1955年,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历经了从新中国

[收稿日期] 2019-07-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BKS034)

[作者简介] 李晨涌,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宋进,男,紫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代史研究。

成立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隐着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与新疆地区实际相适应,以满足新的社会实践需要?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就应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语境下的实际问题^{[2]39}。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必然面临新疆地区社会实践对其真理性的再检验,即对于新疆地区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是否依然是普遍真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看,任何理论都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以避免成为抽象的教条。对此,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3]680}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只有与新疆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现实联系起来,基于“最大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的通俗化”^{[4]468}出发,将抽象的理论变为通俗、生动的群众话语以适应民众的需要,才能使“理论一经掌握群众”^{[5]207},便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进而指导新疆地区的恢复建设和全面发展。

(二)政治基础:党巩固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这一主义在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党组织要求逐步壮大,而当时新疆军阀杨增新实施闭关愚民政策,不但制约了新疆地区的发展进步,也限制了发展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到盛世才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于此时允许研究马列主义的机会,在新疆地区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虽囿于“三不原则”未公开建立党组织,但中国共产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取得了物资上的支援和政治上的声援^{[6]47},在各民族中“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6]136}。此后,由于盛世才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传播一度中断,也迫使共产党人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之后“三区革命”的爆发,对和平解放新疆“是一个重要贡献”^{[7]18}。新疆地区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放新疆地区的战略方针^{[6]102},随后于1949年9月和平解放新疆并成立了人民政府。至此,党领导下的新疆地区人民政权正式确立,也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完成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公开的转变。但是,此时的新疆,外有“泛突厥主义”分裂活动的威胁,内有经济、教育落后等社会问题的遗留,中国共产党亟需带领各族人民开展工农牧业等生产建设,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以实现政权的逐步稳固。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在场体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政治基础。

(三)民心所向: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迫切需求

新疆早期的执政军阀奉行闭关愚民的地方政策,不仅阻碍了“五四”的春风吹入到新疆这片国土,还限制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思想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当地随即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型期,而社会的转型需要靠观念的转变来推动。此时新疆地区民众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各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踊跃参加革命工作。起义部队及其他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力量主动向人民靠拢。一些人正在换脑筋,许多人要求重新学习,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6]130}。但是,部分民众思想上仍存在着一些疑惑和问题,少数人不能明辨是非,容易受敌特分子的谣言蛊惑。同时,当地民众由于教育文化程度所限,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一定困难。譬如在农牧区,新中国成立前农牧民文盲率在90%以上^{[8]20},居住分散又交通不便,难以组织集中教育学习,以少数民族文字编写的宣传教育材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渴望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答思想上的困惑、改善理论匮乏的现状,进而对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说明^{[9]102},在提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进行生产实践。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使得这一需求尤为迫切。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现实境遇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继而较大范围传播,随之又被横加摧残转入地下的过程。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

传播亦由地下转为公开,进而发展为常态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主要体现在话语、文本和媒体等方面。

(一) 话语问题:党组织建设与发展的困顿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没有在新疆建立过地方组织,为后来在新疆地区开展工作增加了困难。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新疆是和平解放的地区,对国民党旧政权接管之后,所面临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其中,外部威胁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继续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开展“泛突厥主义”的分裂破坏活动,妄图割裂中国领土,从而使新疆地区归属于某个外国的势力附庸^{[6]131}。内部挑战主要是新疆地区匪患严重、敌特活动猖獗和农牧区旧政权改造问题。譬如,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国民党驻疆起义部队中的残余反动势力趁我军尚未进疆或在进疆途中,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叛乱,严重影响到新疆地区的和平局面^{[10]93};而在农牧区,不仅建党条件较差且当地实权被封建地主阶级和部落头目所把控。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已然建立,对农牧区旧政权也采取彻底改造的方针^{[10]57},但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发展的少数民族党员人数在1949年底仅有15人^{[11]206}，“解放时少数民族干部也只有3000多人”^{[6]211},远不能满足振兴新疆的需要。此时的国民党反动宣传仍很猖獗,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与其争夺话语权,将社会舆论的导向朝着有利于新疆地区和平稳定的方向推进,还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博弈与对抗中,牢牢把握住话语权,对自身的组织建设此时还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容置喙的。但是,内外交集的困难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关注点和力量的分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组织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二) 文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的匮乏

在新疆地区解放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当地虽有翻译和出版,但是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困难重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文本的传播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地下活动进行,并且也未大规模地进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区生产力落后,财政方面的困难尤为凸显。当时已有的出版机构亟待整顿重组且翻译力量不足,尚未建立起专门的翻译出版机构,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造成了很大困难,影响到党员干部和民族群众的理论水平提高。同时,新疆作为我国的四大牧区之一,“全区有21个牧业县,半农半牧和以农为主兼营牧业的县45个,牧业人口在100万以上,牧业经济在全区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57}。而畜牧业的特点是追逐水草,流动放牧。这就造就了牧业人口一年四季随着畜群转移,流动性大且居住分散,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不仅存在着文本匮乏的问题,同新疆地区民众的实际需求不成正比;且传播的过程也布满坎坷,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

(三) 媒体问题:本土大众媒介传播的滞后

媒介作为承载、传递知识的载体,“是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2]144}。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好比“过河”,新疆地区的本土大众媒介则是承载、传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船只,也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新疆地区民众的桥梁。毛泽东指出,要过河,就要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没有桥或没有船,“过河就是一句空话”^{[13]139}。在新疆地区解放前,受地域因素和社会状况的制约,报纸、期刊和广播等本土大众媒介发展较为落后,其中,广播设备不仅简陋且覆盖地区有限,解放前当地只有一个广播电台^{[14]54}。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虽然对报纸、期刊和广播等本土大众媒介进行了全面整顿,但整体发展滞后。譬如,1950年6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利用接管旧电台的器材,虽然在阿克苏、焉耆、哈密、喀什(疏勒、疏附)、和阗、莎车等专署所在地,建立了最早的一些收音站,但只有7个^{[15]55},且农村广播网职工在1950年时只有25人^{[15]53}。利用电话线路往基层传送广播,但考虑到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牧区人民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6]147},加之资金缺乏,广泛架设专线十分困难^{[15]51}。此外,部分地方还处于“驴马邮政、骆驼电报”的通讯状况^{[6]185}。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需要借助于媒介载体以实现思想的传播,但这一时期,新疆地区本土大众媒介发展滞后,不仅造成了传播内容受限、传播路径单一化的媒介困境,也使新疆地区广大民众获取马克思主义的信息资源较为困难。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不会自发地渗透到社会活动范围之中,也无法自觉地内化到个人的精神意识之中,而是需要借助具体路径进行宣传与推进,有针对性地化解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疆地区实践相结合。

(一)加强党组织建设,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路径

在一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1]17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疆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积极发展党员干部、推进党的基层建设,有效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路径。

一是积极发展党员干部,并对部落头目、牧主等上层人士进行政治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信中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7]27}为了把符合条件的民族精英及时吸纳到党内来,当时的新疆分局采用“破格”的办法吸收党员。同年底,赛福鼎·艾则孜由王震、邓立群介绍入党,包尔汉由王震、徐立清介绍入党^{[6]140},标志着新疆地区第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对部落头目、牧主等上层人士的政治争取,则是向他们反复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在牧区的各项政策,以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同时,为了加强对牧区上层人士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在当地开办政治学校、举办学习班、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向他们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提升部落头目、牧主等上层人士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热情,从而增进新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之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二是积极组建党组织,推进党的基层建设。在新疆农村地区,本着慎重稳进的方针推进党的基层建设。1952年春土地改革试办时,在8个专区12个农业乡发展了51名农村党员,建立了9个党支部和2个党小组,取得了农村发展党员的宝贵经验^{[11]206}。考虑到牧区与农区的情况大不相同,因而发展步骤更为慎重稳妥。1954年前仅在牧区的县、区、乡干部中发展了少量党员。1955年上半年在9个县进行建党试点,发展了67名牧民党员,建立了9个临时党支部,并初步摸索到了牧区建党的经验^{[11]207}。推进党的基层建设、发展农牧区少数民族党员,使新疆各族人民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核心,对此,广大群众高兴地表示:“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就有了靠山,今后就有了带头的了。”^{[16]124}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意义重大,不仅为党组织“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增强了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助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路径建构。

(二)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经典体现。在新疆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不仅要准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立场,更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新疆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密切联系各族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日趋广泛深入。

一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为了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新疆人民政府于1950年初成立编译处,主要运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文翻译毛泽东著作、党的理论政策等书籍文献,仅在1950年,编译处用维吾尔和哈萨克文翻译毛泽东等著作及各种通俗读物高达71种,计120万字^{[17]61-62}。诸如《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著作,当时在新疆地区都编译成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出版发行^{[17]110}。新华书店迪化(今乌鲁木齐)分店也在同一时期成立,业务涵盖了书籍文献的印刷与发行。应新疆地区各民族群众的阅读需求,迪化分店“利用自己的石印机和其他简陋设备,翻印一批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其他各种文字图书在新疆地区发行,共约31种,印行11万多册”^{[17]61}。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51年初改组成立,采用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蒙古语、锡伯语、柯尔克孜语6个民族的“9种文字”,汇编出版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及毛泽东著作、干部学习材料和科学专著。《毛泽东选集》维吾尔文版与哈萨克文版单行本于1952年在新疆地区翻译出版^{[11]278}，对于提高新疆各民族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工作。新疆地区解放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的工作主要是由政府 and 书店来开展，运用本地少数民族语言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学习。

一方面，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成立之初，十分注重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新疆地区在1950年2月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的学习规划，以便于组织省、市级机关的党员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把这些党员划分为高、中、初三个组别。其中，高级组讲授的内容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在延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初级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11]278}，目的在于让每个同志认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奋斗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增进每个人对巩固与发展胜利的信心。

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书店的发行网点较少，当时已经成立的书店为供应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阅读需要，纷纷组织流动供应组（队），深入到农牧区开展流动供应，如南疆的和田、莎车、喀什、叶城、焉耆、库车等地的书店。北疆的伊犁、塔城等书店组织牧区流动供应，配合慰问团、贸易小组、电影放映队深入牧区帐篷供应书刊，流动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干部和农牧民群众的欢迎^{[17]522}，对深入而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三）完善本土大众传媒，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体路径

传播媒介是理论传播的基础保障，“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18]9}。新疆地区和平解放后，本土大众传媒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蓬勃发展，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建构了系统全面的媒体路径，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

一是全面发展本土报纸期刊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日报》正式创刊且冠以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报名^{[15]58}，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疆地方党报，也是“新疆第一个公开党组织的单位”。《新疆日报》作为全国唯一采用“四种文字”出刊的报纸，准确全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反映当地民族群众的呼声。同时，《新疆日报》还开设有副刊、专刊和画刊等等，内容富有民族特色又增强了可读性。譬如，《新疆日报》的文艺副刊发表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文艺作品，诸如，反映解放军进军新疆斗争历程的长诗《通过严寒的封锁线——祁连山》、介绍革命领袖的散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通俗文艺作品《孚远县妇女识字班劝学歌》、歌曲《走向生产战线》等^{[15]218}。可见，《新疆日报》作为新疆本土的主流大众传媒，全面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大众化传播。

二是大力推进当地广播电台建成。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大力推进各专区、县普及建成收音站。新疆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报纸传递缓慢，因此，全疆各地的收音站便成为了各专区、县范围内唯一的新闻舆论中心。

收音站普遍采用在街头架设喇叭的形式，初期为汉语和维吾尔语双频制播放，每天按时转播省台新闻节目，及时地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大事传送给城乡各族人民。“在焉耆专区的干部学习班有120名学员，积极收听省台的理论学习广播讲座，深入学习社会发展史。”^{[14]71}这有助于提升干部自身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理论水平，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新疆地区各族群众生活实践的结合。此外，为进一步扩大收音站的传播范围，当地利用“巴扎（赶集）日”进行宣传，送广播下乡。例如昌吉、玛纳斯、托克逊、伊吾4县收音站，利用“巴扎（赶集）日”携带收音机下乡向群众宣传。到1954年，全疆范围70个收音站组织群众收听广播达91万多人次^{[14]71}，群众赞扬道：“小小喇叭箱，天下大事里面装，又唱歌来又唱戏，一天不听心里慌。”^{[14]75}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效果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日趋广泛与深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建设发挥了重要的

促进作用,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奠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思想与理论基础,有利于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的理论素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不仅历经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历史过程,还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公开的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诉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在场体现,深度契合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理论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直观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概念和方法。面对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求,党和政府通过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本路径,不仅回应了这一理论需求,提高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理论素养,还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传播内隐的前提性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有了全面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真正结合了新疆地区的特殊语境,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实践再次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从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有力回应。

(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组织建设,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传播的主体,其队伍整体素养如何,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深入传播,中国共产党积极吸纳少数民族党员,为党组织“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对党员干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理论宣传教育,以提升党员干部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而打造一支立场坚定、素质过强的党员队伍。这一队伍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传播的推动力,是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保护力,也是维护新疆地区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捍卫力。在农牧区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推进党的基层建设,使农牧区各族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话语权的把握,也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增进民族和睦。譬如,1952年位于喀什地区疏附县喀什葛尔河南岸的帕哈太克里乡的农民给毛主席写致敬信,表达对党的感恩和热爱之情;1954年和田地区于田县确可拉村的库尔班·吐鲁木老人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成为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热爱毛主席、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19]162}。

(三)推进了本土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提升,有利于巩固党在新疆地区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土传播媒介作为传递、延伸信息传送的载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发挥出了“桥”和“船”的基础功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新疆地区民众的连接,也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这一过程中,本土传播媒介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本土传播媒介自身的基础功能发挥也推动着自身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滞后状态,发展到了新疆地方党报成立,收音站在各专区、县的基本覆盖的阶段;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得到了不断提升。同时,本土传播媒介作为新疆各族人民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肩负着新疆各个地区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任务。作为党的舆论阵地的重要抓手,本土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提升,不仅注重传播内容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多元,还贴近新疆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这一过程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体现了本土传播媒介素养的不断提升。譬如,莎车警训班8位维吾尔族学员从广播中听到赴朝慰问团报告后,纷纷要求参加志愿军;省电台转播迪化市公审美帝间谍、叛匪大会实况时,全疆有9万多人收听。可见,本土传播媒介不仅能为新疆地区群众的思想需求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还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8]黄家庆. 新疆民族学校教育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 [9]毛玉美.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 [10]党育林,张杰玺. 当代新疆简史[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 新疆通志:共产党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 [12]波特. 传播学概论[M]. 陈亮,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 [13]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 新疆通志:广播电视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 新疆通志:报业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 [16]朱培民,王宝英. 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 [1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 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M]. 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18]霍洛克斯. 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M]. 刘千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9]李瑞君. 当代新疆民族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Xinjiang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1949—1955)

Li Chenyong, Song Jin

(College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Xinjiang has gone through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er, from concealment to openness, and then to normalization. This process, which contains the inherent demands of Marxist theory, is the pres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ower and deeply meets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Faced with real problems such as discourse, text and media in the spread process,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strengthened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o construct a discourse path,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classic works to construct a text path, and improved the local mass media to construct a media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 has laid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strengthened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Xinjiang,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local media. It has also provided a realistic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Marxism in ethnic areas.

[Key words]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rxism; Xinjiang; sprea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任编辑 戴正 责任校对 戴正)